

口述

打更

□ 范兆金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。20世纪80年代,忙忙碌碌的秋收会持续一个多月,家家户户缸满囤尖。房顶上也找不到一块空闲地方,晒的满是花生、棉花、红枣等。村子犄角旮旯堆满了玉米秸、高粱秸、棉花秸、花生秧,就连土墙头上也披满了地瓜秧,村子显得臃肿,像是怀胎十月的孕妇,又像是穿了一层厚厚的棉衣。

等到所有地块播种上冬小麦,草木萧疏,这时已是深秋,或者是初冬,北风呼啸、冷雨淅沥,人们都穿上了厚衣裳。此时,一年一度的位山清淤便提上了日程,村里壮劳力悉数上场,去50多公里外的位山参加全地区清淤会战。

村里壮劳力前脚刚走,吃过晚饭,老支书敲响挂在村中央一棵老榆树上的大铁钟,召集全村妇女及45岁以上的男劳力开会,部署晚上轮班打更的事,以防盗贼惦记村里的牲畜及秋收果实。那个年代,物资还比较匮乏,一枝一叶都显得非常珍贵。壮劳力不在家,村里就组成以妇女为主力的打更队。老支书的意思是,先自由结合,四户一晚上,分上下两个半宿,以零时为界,若不愿意自由结合,就直接指派,分组结果就张贴在老榆树旁的墙头上;所有组轮完一轮,结对小组上半宿、下半宿调换;如果村里丢失东西,就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

任,并照价赔偿;尽力看护好家里的一草一木,以免在外挖河的壮劳力们分心挂在家里。分完组,妇女们便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打更,哪里该多转转,哪里可以少转一圈。生性胆小的二婶子拽住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嫂的衣袖不撒手:“我就死赖着和你一组,谁也别想把你从我手里抢走。”这句话引来一片爽朗的笑声。

壮劳力上位山清淤,村里的琐碎事少了些许,磨面喂猪、纳鞋底、纺棉线都是家里妇女一个人承担着,不用争也不用抢,少了拌嘴闹别扭,很是清静。晚上打更成了村里妇女们的头等大事。上半宿还好,吃过晚饭,扒上一簸箕棉花桃或者纳上一只鞋底,精神着呢。等到九点后,喊上同组的姊妹,在村子里转上两圈,时间差不多就到了零时,该换班了。上半宿打更的妇女挨家喊醒下半宿打更的姊妹,回家钻进被窝倒头便睡。打更,下半宿最难过。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,上半宿,贼不好下手;下半宿,贼趁乡亲们熟睡才下手,一偷一个准。下半宿打更的村民,不敢掉以轻心,特别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盗贼最容易得手的时候,即使困得上眼皮直碰下眼皮,也得强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巡夜。俗话说:贼,偷风不偷雨。月黑风高夜,犬吠此起彼伏,好像有人进村,责任在身的妇女们武装好自己,与同伴马不停蹄从一个街口赶往下一个街口。若是北风裹挟着细雨,冷飕飕地打在脸上如针刺一般,盗贼就

不敢轻举妄动,因为雨夜作案容易留下痕迹,打更的揣测透了盗贼的心理,便会躺在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。老支书说:贼,见不得光。打更的不不管是妇女、半大小子还是老弱病残都是带着光亮的。若是哪一组偷懒没有打更,逃不过老支书的“火眼金睛”,他古铜色的脸便会拉下来,批评得人抬不起头来。

母亲和东院桂英嫂子分到了一组,一次轮到下半宿打更。我央求母亲不下三次,打更时要叫上我。扒了半宿的棉花桃,手扒得生疼,上下眼皮直打架,我还是强忍着不上炕睡觉,母亲再三催促:“别逞能了,快点睡觉去吧,到时叫醒你便是了。”实在是熬不下去了,我连衣裳都来不及脱,倒头便睡。上半宿打更的在院外高声大喊,母亲生怕惊醒熟睡的我,低声应允,蹑手蹑脚关好屋门,与东院桂英嫂子会合,一道去打更。待我醒来,已是东方泛白、鸡鸣三遍,母亲打完更回到了家。看到母亲没叫醒我,我的倔脾气上来,一天没有说话,母亲拗不过我,答应下次打更一定叫上我。果然,再一次打更的时候,母亲没有食言,轻轻叫醒我:“快起来,打更去。”我一骨碌爬起来跳下炕,揉着惺忪的睡眼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母亲去打更。万籁俱寂,村里村外一点灯火都没有,寒气逼人,我被冻得全身直哆嗦。隐约间,我们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,很是吓人。人多胆大,我们走近一瞧,原来

是一个玉米秸捆立在墙角。突然,一个黑影“嗖”的一下蹿进柴火垛里,吓我们一跳,是野猫还是黄鼠狼,谁也说说不准。前面怎么有火星闪闪?上前一看,原来是上半宿打更的那一组村民点火取暖留下的。全村已经逛了一圈,没发现情况,浑身冻透,何不也抱捆玉米秸就地烤火?再说了,盗贼老远看见光亮也不敢来。重新燃起的火焰给我、母亲、桂英嫂子无形中增加了一分勇气。母亲让我守着火堆,她和桂英嫂子再围着村子转上一圈,确保万无一失。大家约定,鸡鸣三遍,打更才能结束,谁也不能搞特殊。

有一天,村后街老蒿头的闺女夜里与人私奔。老蒿头到老支书那里告状,说是当夜打更的玩忽职守,放走了他闺女和邻村小伙子,理应受罚。开明的老支书哈哈一笑:“我说老蒿头,这都什么年代了,年轻人自由恋爱,书上说得明明白白。打更的哪能横插在男女中间啊!”老蒿头无言以对,悻悻地回家,“吧嗒、吧嗒”一个劲地抽烟。

打更近一个月,全村没发生一起盗窃事件,在位山清淤的壮劳力如期归来,全村顿时充满阳刚气。打更,又成了男人们干的活。老支书长吁了一口气:这下,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

远去的影碟机

□ 刘国瑞

20世纪90年代,唱卡拉OK像一阵风席卷我所在的临清市区。天一黑,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广场上唱卡拉OK的人比比皆是,人人是明星,个个飚歌喉,低音炮“轰、轰、轰”,震得大地都在颤抖。

那时,去唱卡拉OK的人首先要看电视机屏幕够不够大,音响效果够不够好。二叔家的三妹在火车站支了个摊,因为音箱设备比较好,一到夜晚人流不断。我和妻子刚结婚,一次,去三妹那里玩,由于时间早,还没大有人,三妹非让我们唱两句。盛情难却,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起唱的那两首歌,都是男女对唱,一首是《我听过你的歌》,

一首是《糊涂的爱》。这一唱,夫妻两人就在一起糊里糊涂待了30多年。

乔迁新居后,我们拿出从牙缝里省下的4000多元,把一台三星牌大小盘通用的影碟机请回了家,连到飞利浦电视上,组成了个家庭影院。一到周末,我们门也不出,在家自娱自乐。偶尔有同事来玩,影碟机就派上了用场。起初我们还顾及楼上楼下的邻居,酒一多就顾不上那么多了,调大音量,可着嗓子喊到嘶哑。好在我家住在顶层,楼下开饭店的邻居经常不在家,对门邻居经常被我拉到家里一起娱乐。唱到尽兴,我们分别时互相拥抱,尽是恋恋不舍。

说实话,那时,三星牌大小盘兼容的影碟机在县城屈指可数,一台机器4000多元,舍得买的没几个。这跟

当时妻子的消费观念有关,要买就买最好的。机器买回家,100多元一张的大盘碟却一张也没舍得买,权当小碟机用。

同事第一次到我家来温锅,妻子还闹出个小插曲。酒后吃面条,不常做饭的妻子下了一大锅,时间一长,面条坨成团,挑都挑不开,最后只能一人一碗当作面糊喝。好在来的没外人,大家一笑而过。妻子却十分羞愧,至今提及此事,还不好意思。

进入21世纪,卡拉OK由室外开到室内,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大街小巷。有的饭店也搞起多种经营,把卡拉OK搬到单间里。家里的影碟机就成了我和妻子的专属,作用也由唱歌改成了看电影,十几元一张的光碟轮流看,主要是武打电影和喜剧小品,

比如成龙的《警察故事》系列、李连杰的《黄飞鸿》系列、赵丽蓉的小品系列等,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2002年,因工作变动,我家的影碟机就停了工,悬挂在墙上方的两个音箱也光荣“下岗”。

一天,妻子收拾储藏室,把橱柜架上“睡得正香”的影碟机翻了出来,经过长时间的休眠,影碟机已“老态龙钟”,再也不能使用。妻子说:“卖了吧,留着不能使用,还占地方。”

我说:“放着吧,卖不了几个钱,权当留个念想。”

就这样,影碟机又重新躺在了我们新家的柜子里。每当看到它,便会勾起我对逝去时光的追忆,那段时光也被永久埋在了心底。